

◀ (上接8版)

1988年第3期)中已明确提出“研究古籍版本,不但要注意不同的刻本,还要注意同一刻本的不同印次”的观点。在程先生参与点校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一书中,也充分注意到底本的印次选择。然而,或许是限于当时古籍利用的客观条件,这些可贵成果都未能体现在《释例》中。从这一点来说,《困学纪闻注》在底本选择上能具体到某一印本,较《释例》的要求无疑是进了一步;更难能可贵的是,这种进步的取得,来源于中华书局年轻一代编辑的主动担当。中华书局老一辈学者谦逊地将《释例》称为“初稿”,以示后辈可依据实践加以修订。而随着古书利用条件的逐步改善,《释例》“校勘部分”的个别观念与表述也确有加以完善的必要。希望这样有意义的工作能由书局老一辈学者带领年轻一代学者来共同完成。

《困学纪闻注》点校本的推出,一方面为当前的古籍整理树立了新的典范,另一方面,也为学者进一步研讨思考提供了有意味的话题。

翁注的原刻本,据笔者所知,其实存在三种印次,彼此文字互异。原本刻成之后一年翁元圻才去世,他还有时间对印板加以修订,所以笔者猜想上述两次改动均出自作者本人。

所见之初印本,一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十四册,曾为宋育德故物,钤有“奉新宋育德印”、“公威藏本”、“卷雨楼”等印;一中华书局图书馆藏本,八册,曾为沈闾岷故物,钤有“北座从官东山外史”、“肖岩藏书之章”等印,书眉多有朱色校笔,出自与中华书局渊源甚深的前辈学者孙人和先生之手。这两部印本印次一致,均有数处明显的讹脱。卷二“郑康成注《禹贡》九河云”条,初印本翁注之末有“《书》《诗》正义皆孔颖达所作,而不同如此”一句,为后来印本削去,但比照翁注稿本,实有此句,可见初印本并非一无可取。

所见之中印本为上海图书馆藏本,相当于点校者所称之“后印本”,文字有挖改订正。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翁注原刻本,有李慈铭批,凡例末有李氏手跋,也属中印本(《续修四库全书》曾予影印)。检李氏《越缦堂日记》咸丰辛酉

(1861)七月初十日记,有“翁载青全是簿录,略无心得”之语,不算好话。国图藏本上的李氏跋较晚出,称“后得余姚翁方伯此本,则为窈人解衣珠矣”,通篇写得成熟稳重,全无当年的犀利风格。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李氏随年岁增长,加深了对本书的理解;另一方面,本书既是翁氏曾孙“巴兰农部”所赠,李氏作跋时便不免有人情的考虑。巴兰指翁元圻之孙学潜的长子翁琳,一名庆龙,字述曾,曾任户部河南司主事。

所见尚有一种后印本,在中印本基础上改动文字,比如卷十一“籍语燔书”条,翁注引《史记·始皇本纪》“丞相高杀二世,恐诛,乃详以义立我”,初印本、中印本均作“详”,后印本挖改为“诈”。查考现存《史记》早期版本,无论是属于单《集解》本系统的宋绍兴淮南东路转运刻司本,还是属于《集解》《索隐》本系统的宋淳熙桐川郡斋本、宋乾道蔡梦弼东塾本,属于《集解》《索隐》《正义》本系统的宋建安黄善夫本、元至元彭寅翁本,此处均作“详”。这段文字又见于《资治通鉴》卷八,属于浙本系统的宋绍兴两浙东路茶盐司本、明嘉靖孔天胤本作

“详”,属于建本系统的宋刻十一行本作“诈”,元建刻胡三省注本及清嘉庆胡克家翻本同作“诈”。由此判断,翁注后印本这一处改动实有所据,也许并非出自《史记》,而是出自《通鉴》建本系统的某个本子。

孙通海先生确定原刻中印本为底本,无疑是正确的选择。他以中印本为据来撰写校勘记,对这些异文均不出校,也是常规的做法。按行业过去的一般认识,这些内容只须点校者自己知道即可,逐条写出来,不但不值得夸耀,反而像是给读者增添了麻烦。从《释例》来衡量,这已完全符合要求。不过,翁注原刻本是一个比较特殊而又典型的例子,它有三种印本,文字各有特点,即使文字多误的初印本,也有个别内容与更早出的稿本发生联系;而后印本的异文亦自有其文本依据。这些印本异文又对后来传本产生影响;比如刻于清咸丰间的经纶堂本、小娜嬛山馆本便出自原刻中印本;清光绪十三年(1887)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及后出的上海点石斋、文瑞楼、鸿章书局等诸家石印本则出自原刻后印本。从完整建构文本形成历史、反映文本流变过程的

角度来要求,上举的某些异文恰恰是有必要予以呈现的。

笔者提出这一点,并非仅仅针对本书,而是想通过这个实例,反思目前古籍整理点校的一些习惯做法。以《释例》这一学术成果为代表,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古籍点校整理其实是以“备列众本、定其是非”作为基本观念与目标,很少从客观反映文本系统特征与线索的角度对校勘作进一步要求。随着版本研究的深入,这种做法的负面效果会逐步显现,甚至会影响到一些目前正在进行工作的成效。当然,这是从本书衍生而出的题外话,可以另写文章讨论。回归本书,除底本选择之外,本书其实还有不少可称赞之处,如新编目录,为条目加排数字码,排版分清眉目,都为阅读带来方便,有心的读者自能体会,不必笔者赘述。在此要郑重地感谢点校者孙通海先生,感谢中华书局具有高度专业素养的编辑,感谢他们为大家提供了一部高质量的整理本。

(本文撰写得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先生、中华书局图书馆张威先生、中华书局编辑李爽女士的帮助,谨表感谢) ■

## 智库起源趣谈

编译/高耀

如今在美国大行其道的“智库”是一些很有意思的机构。专家们煞有介事地恭候在此,不管他们隶属于布鲁金斯学会,还是听命于美国传统基金会,总之都是用自身的专业知识来为一些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因素背书。并且,无论是多么高明的专家,他的见解最终总是要和意识形态相吻合的。卡内基基金会忙于推动“加速废止国际战争”,布鲁金斯学会在潜心研究联邦政府,看上去个个都在为严肃的事情操心,个个都仿佛拥有一个可以解决世界上一切疑难杂症的超级智囊团。

最近,《纽约时报》和其他一些行业出版物揭示的诸如金融、能源监管、环境问题和烟草企业等问题,直接显示,有些智库参与了数据操纵,还利用专家对一些科学问题和政府事务发出不客观的评论。民众对此也并未感到特别惊讶,他们多少也知道,如今所谓的专家可能已经成为了驴象之争的宣传工具。

历史地看,为了宣传目的而不断生产数据、报告的专家

团队的确已经成为了有力的政治工具。但是,智库这种团队形式,从最初的产生到发展成现在的样子,其实是走过了一条变化发展道路的,其中既不避讳种种金钱的交换,也有自由思想和独立意志的彰显。对智库而言,这两者都是它的基因。

在欧洲,智库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9世纪。当时,君主开始和天主教会争税。雇佣一支独立的律师团队,为君主的经济和政治权利与教会对抗的传统,一直从当时的查理曼大帝延续到17世纪。17世纪法兰西的君主们仍然在喋喋不休争取主教的任命权以及将教会的部分收入收归已有的权力。在这旷日持久的争吵中,教皇和君主纷纷求助于律师——一般是独立的贵族或神职人员,他们一定程度上保有专业层面的独立性,在此基础上提供建议。从16世纪到19世纪,在新教和天主教改革期间,神职人员和法律历史学家团队合作,搜遍档案馆和图书馆,书写了守护君主的宗教权力和税收权力的历史。

新教的学者辛苦耕耘,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于是被天主教会视为眼中钉。于是,天主教会也组织人手大搞学术研究。这一时期的此类独立学术团体几乎可以被视为今日智库的祖先。

“智库(think tank)”这个词虽然是现代词汇,但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17世纪的人文学术脉络中。《牛津英语词典》中把think tank一词解释为:a body of experts, as a research organization, providing advice and ideas on specific national or commercial problems (作为研究机构的一个专家团体,对特定的国家事务和商业事务提供建议和看法)。过去与“think tank”最接近的词是“bureau”,解释为“专业人员的组合”,通常是指在政府机构内的专业人员。17世纪皮埃尔·芮契雷(Pierre Richelet)的《词典》中,用“bureau d'adresse [aides mercantiles]”这个词来指

称当时著名的医学家、慈善家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Théophraste Renaudot)位于巴黎的办公室。这个办公机构得到了当时权倾一时的红衣主教黎塞留的特许,这不仅是一个扶助穷人的医疗专家机构,也是一个听命于黎塞留的新闻和宣传中心。

16世纪末、17世纪初,研究团队十分普遍,国家也非常依赖独立的学者及其专业知识。比如,1630年代末,Théodore Godefroy是很受黎塞留重用的历史学家和档案人员,黎塞留还曾派他处理外交事务。Théodore Godefroy既不是重要的贵族,也不是职业外交人员,但他

在统治秩序、封建权力、教规和民法、内部管理、政治历史和国际商贸等方面有专业知识和卓越才能。路易十三早在1613年就任命他为皇家历史学家,1615年任命他为皇家档案的保管总监。按照今天的通行称法,Théodore Godefroy相当于技术专家或顾问,依靠自己的专业知识为重要事务提供咨询。这其实就与今天的智库专家非常相似。

(节选编译自南加州大学历史学教授Jacob Soll发表于Tablet Magazine上的文章,全文原题为“How Think Tanks Became Engines of Royal Propaganda”)

### 更正

2017年2月10日本刊第279期,《漂洋过海的赤壁赋》一文作者在荷兰莱顿大学(Universiteit Leiden, Leiden University),14版末误为德国。该校是荷兰名校,创办于1575年,

获诺奖者有16人,亚洲研究也历史悠久。莱顿还有家博睿(Brill)出版社,素来以出版研究东方传统人文学图书著称于世。

以上承蒙徐文堪先生相告。特此更正。